

江南民居中的厅堂环境与书斋环境

Comparison of Jiangn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Between Hall and Study

杨玲 张明春 Yang Ling Zhang Mingchun

摘要: 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礼制文化历代为统治者所推崇,它给传统社会生活中包括居住环境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江南传统民居中的厅堂和书斋作为正统居处和非正统居处的代表,在映射礼制文化方面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居敬与闲适、制度化和个性化的对比效果,其中书斋空间设计因其中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个人风格倾向更可被看作是我国传统室内设计领域早期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 礼制,厅堂,书斋,文人生活方式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fucianism, the code of etiquette culture impacted deeply on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society, including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was advocated by the rul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Jiangnan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between hall and study, be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dwelling space, showed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did the contrasted deed: serene and easeful, systematic and personalized. Study design, thereinto, embodying "people-centered" thought and some personal style, especially can be seen as the successful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ield of interior design.

Keywords: The Code of Etiquette; Hall; Study; Lifestyle of Literati

美国学者拉普普特在《住屋形式与文化》一书中认为,住屋形式的形成不能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理由,而是许多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在这些影响住屋形式的因素中,社会文化因素是最重要的,它对住屋形式的生成起着主导作用。儒家思想作为备受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文化流派,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从对宫室基本属性的看法到对室内空间与陈设的经营均以儒家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为依据,他们认为房屋建筑及其内部空间不但有着遮风避雨等物质上的功能意义,还应体现关于“礼”的社会政治文化内容。

儒家思想中对“礼”的各种经典性论述认为“礼”包含了上下有别、左右有序、贵贱有差等社会秩序和人伦规范的内容,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关于宫室构建和室内空间装饰陈设的各种等级制度与规范等的制订都与达成建立儒家思想和封建统治者所希冀的相融而契合的世界秩序的政治目的相关。然而,用政治、伦理的经纬线所织就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网络毕竟有其波长,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既有中心地带、也有边缘角落。明清江南民居中的正统居处——厅堂和非正统居处——书房由于所处伦理地位的不同,在空间位置、平面形态、室内装修及器用陈设上对礼制文化也有不同的反映,二者相较显现出庄重恭持与随性闲适的对比效果。

一、室内布置特点的对比

作者单位: 杨玲,文学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助教,研究方向为室内设计和环境景观设计;张明春,硕士,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助教,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和逆向工程



图1

明清江南民居中的厅堂亦称大厅或正厅，作为全宅最重要的主体空间，处在正落的显著位置上，通常在位于正落的门厅、轿厅或茶厅之后，在全宅中空间最大、装饰最精美。正厅通常面阔三间或五间，硬山顶，五架或七架梁，内部结构富家用扁作、小康者用圆堂。厅正中的明间较大，次间较小，前部有敞轩或迴廊，厅前隔着天井或庭院通常有雕饰精美的门楼作为对景。在“居中为贵，左右为次”的礼制观念影响下，厅堂是宅院中政治和伦理等级最高的处所。

例如江南六大厅堂之一的网师园正厅万卷堂，其建筑体量在全宅中是最大的，屋宇轩昂，三开间，百来平方米的空间具有高、敞、正的特点。厅内上方的雕花梁架、黑漆大立柱和十八扇白漆格显得正襟肃然、气度严明。厅北屏壁上悬挂着青松画轴的中堂，其下硬木翘头案上陈列插屏、供石、青瓷古瓶等，取意“平平静静”、“终生平静”，两侧是两架对称的花几和盆景。在中轴线上布置着八仙桌，方桌的东西两侧摆放着明式黄花梨浮雕靠背圈椅，分别是主人和贵宾的首席，东为主、西为客位。居南，轴线两侧竖直排列着陪客就座的椅几，由北至南分别是两对东西对称的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和一对没有靠背扶手的藤面坐墩，沿墙则南北布置有半桌以及供政治地位更低的人下坐的四对玫瑰椅。四列对称的卑位椅具与尊位椅具在材料、工艺、尺度和造型等

方面都存有差别，以强化卑位作陪、尊者为序的人伦尊卑与等级关系。堂内整体布局陈设严整规范，一室之内主客、尊卑、上下等秩序等级一目了然，严格遵照长幼之分、贵贱之别，处处体现了儒家的礼制规矩（图1）。

而作为偏室的书斋就不这么合乎严明的礼制规范了。古代建筑的等级制度明代一直在进行修订和补充，入清以后，清制在平面上还保留着部分明代的遗规，如仍限面阔三间，但江南殷实人家钻律法空隙，将厅堂朝横向大肆扩张，间数在左右两翼增加者大有人在，横向变通得来的隙地多建书房或花厅等。书斋安排的地点在住宅中灵活性很强，通常位于中轴线的左侧或右侧的东落和西落，或者离正落更远。《园冶》中对书斋的位置特点有所描述：“斋较堂，惟气藏而致敛，有使人肃然斋敬之意。盖藏修密处之地，故式不宜敞显。”意即斋不同于堂之处在于斋必须位于僻静、远离正统和人事政治的纷繁之地，且形式上不应敞显，以便于人们聚气敛神、怡情养性。

书斋的平面布置在方位上比较自由随意，少有礼数定制的痕迹，这从明清江南文人的专著和笔记中关于书斋平面布置丰富多样的描述里可见端倪，例如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关于书斋室内布置的具体篇章：“天然几一，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栏以逼风日。……屏风仅可一面。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在书肆中。”^[1]（图2）另一位江南文人高濂则在其所著《遵生八笺》中对书房布置进行了更加丰富和细致的介绍：“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忧心。”^[2]

比起正统居所厅堂的沉重和肃穆来，书斋虽然也处在礼制约束的范围里，大约因为远离正统之外，居于礼制影响的边缘地带，所以其室内布置较少强调受礼制影响的方位观，显得比较轻松灵活、不拘一格。

二、室内装饰装修审美取向的对比

明清江南民居中的厅堂作为整个住宅中礼仪化和神性化的空间所在，在家庭结构中占据着精神和行为的统治和中心地位。正如计成的《园冶》

图1 网师园大厅万卷堂

中所言：“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意。”作为占据一宅之中“堂堂高显”地位的空间，第宅中的厅堂多具有公共建筑的性质，用以会见宾客、宴请亲朋、行婚丧仪礼等等。厅堂对“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家庭的社会地位、权重和脸面，因此其体量和装饰装修通常是宅邸中最为考究的。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认为“堂之制，宜宏敞精丽，……四壁用细砖砌者佳，不则竟用粉壁。梁用球门，高光相称……”他对厅堂的装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认为堂不但要空间宽敞，其室内装饰装修也必须认真对待。

明清江南民居的厅堂装修中不乏“精丽”的典范，此处以同为江南六大厅堂之一的彩衣堂、系翁同龢故居正厅为例。翁氏宅邸始建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是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的江南民居。住宅以中轴为主制定形制格局，分为东、中、西三落，其中中落（即正落）依次穿过门厅、轿厅后便进入正厅——彩衣堂。彩衣堂为三间五架梁，并轩前后廊九架椽屋，硬三五脊顶。据考证，此堂建于明万历末年，为四品官的建筑形制。堂内装饰集雕、塑、绘于一体，梁、檩、枋、木等构件均有透雕的云鹤并描金，更有沥粉堆塑的狮子、蝙蝠、寿桃和堂内石柱础上的花卉、动物石雕图案等等。这些装饰中最精贵出彩的要数堂内翻轩木质构件上的包袱锦彩画了，其制作方法是在木质构件上勾勒出包袱状的图形，在包袱边内沿画上如丝绸锦缎上所织的花纹图案，称“包袱锦”，然后在包袱当中绘上各种题材的图画。彩衣堂包袱锦彩画的内容有“喜上眉梢”、“鹤鹿同春”、“麒麟送子”、“游龙”、“海棠花”等，共计116幅，覆盖面积约150平方米。百余幅题材丰富、绘制精细、色调素雅的江南包袱锦彩画和手工精湛的木雕、石雕等艺术品充分体现了彩衣堂在宅邸中尊贵典雅的正统地位（图3）。

美的观念在源头上是与功利目的直接联系的，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宫室体系中，对美的追求则是和对贵的追求合而为一的。在江南民居装饰装修水平十分发达的明清时期，为满足辨等示威方面的要求，厅堂的室内装修装饰不可避免地朝着更复杂、更华丽、更细致的方向发展，而作为“余屋”的书斋在规模、体量、材料和装饰的华贵程度等方面都远不及厅堂，且极具私人性质，功能、风格和趣味的设定以迎合文人的生活方式为主要原则，因此明清江南民居中书房的室内装饰



图2

装修与文人的审美倾向关系较为密切。

书斋中的装饰元素常常来源于文人的生活习惯，例如对琴这种乐器的运用——操琴作为文人一项高雅的消遣活动，更多时候作为显示文人雅趣的一个装饰符号被运用到书房装饰中。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书房有过如下描述：“……壁上亦有各式凹槽，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文震亨一语道破个中意味：“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东晋陶渊明居室墙上悬无弦琴一张，彭泽令淡淡然言：“但识琴中趣，和劳弦上声。”名士风流之态跃然纸上。由此可以看出琴作为一种高雅的装饰符号在书房装饰中运用得比较普遍，而其它形式，诸如扇面图形在书房亮格柜两侧壶门牙子、窗洞、装裱画框等上的运用可能也源于文人玩扇的雅好，这些清新自由的图形在庄重的厅堂上通常是不会出现的。

明清江南民居中书房的面积通常不大，室内常以藏书橱分隔空间，一物两用。另一种运用最广泛、最具文人气质的空间分隔材料要数竹帘。江南气候适合竹的生长，竹帘因竹的独特品格和分隔的曼妙效果最受文人青睐，传统文士也从竹帘的世界里萌发出了闲适从容的文化心志和清韵人格。

图2 明代书斋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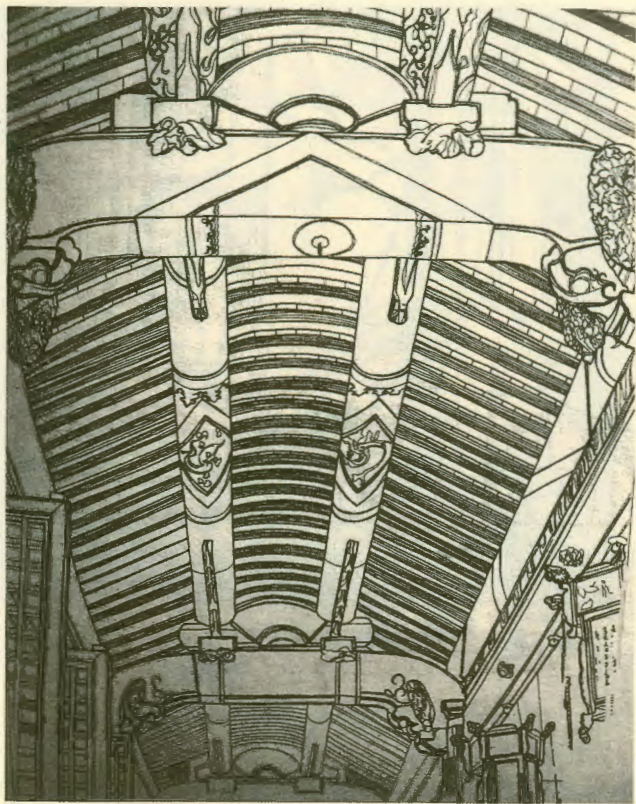


图3

书斋装饰装修中的审美追求“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简无俗，至于萧疏雅洁”^[3]的高雅清超之境，映射出文人对自我空间的经营和掌控。

基于厅堂在民居中的政治伦理地位及其作为张显家庭颜面的标志性空间的实际需要，它与书房的装饰装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风格，一者是充满政治意味的雍容富贵，另一者是氤氲文人气质的清雅疏淡。

三、器用陈设意蕴的对比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认为环境具有感化育人的作用，孟子在《尽心篇》中关于“居移气，养移体”的深刻论述表达了他们强调居所应将身心锻造并重的看法。明清江南民居厅堂内的器具陈设作为室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内涵。

和前文描述过的万卷堂案上陈设相似，江南民居厅堂屏壁前的条案上及左右两侧通常陈列着插屏、瓷瓶、西洋钟等物件，此外诸如南浔懿德堂中硬木翘头案上的瓷瓶及旁侧的立式自鸣钟等陈设都是取“终身平静”、“平平静静”之意，从

“隐”、“微”处要求人们保有平和、谨慎、恭持的品质，而这恰好说明人们在厅堂中居敬、恭顺的态度是通过克制、调节个人情感的真实展露来实现的，也泄漏出人们对生活和艺术的情感在民居厅堂中通常处于受压抑状态的真相。

另外，厅堂中椅具的尺度、比例和造型也起着协助人们保持“居处恭”状态的作用。通常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苏作家具的尺寸、比例及各种关键部位的设计都是科学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然而近年来出售明清家具的古董商们在交易中经过测量发现，明清的扶手椅通常座高在440-520厘米之间，比现在椅子的座高要高出20-140厘米，在明清至今的几百年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并无多大变化的实际情况下，古人端坐时双脚势必离地约10厘米左右；另外，椅背与人体脊椎的曲线相吻合，其上“搭脑”的高度恰与人的颈部平齐，使头部可顺势竖直搭靠，同时形成双脚竖直、背部挺立的坐姿，自然地塑造出了人们在厅堂上正襟危坐的气度——厅堂的器用陈设作为礼制的物化形态，正是这样协助人们构建了“居处恭”的行为方式。

由于秉性多样、读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明清江南民居中书斋器用物品的内容较之呈均质化的厅堂陈设，显得丰富而又个性十足。文震亨《长物志》中的“小室”描绘的就是如此一番别有的风味：“小室内几榻俱不易多置，但取古制狭边书几一，置于中，上设笔砚、香盒、熏炉之属，俱小而雅。……或以小佛橱供鎏金小佛手于上，亦可。”^[4]这样的书房集静卧、品茶、拜佛、写作于一处，是情趣十分丰富的文人高级私密空间。

文房书斋既是著书立说之所，又是清修养性之地，文人在此读书作画、静卧、打坐，尽情展露其闲散的生活姿态。从传世遗存的明代家具中可以发现，当时已经产生了书斋专属或与之配套的家具系列。

书斋中的椅凳与“居处恭”的厅堂椅具相比也有着支配观念及形态上的极大差别。李渔在《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详细描述了舒适宜人的书房椅具“暖椅”和“凉机”，其中暖椅的内脚栅下设有一贮存炭火的抽屉，有着“御尽奇寒，使五官四肢均受其利而弗觉”的效用，江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这样的椅具对终日伏案的文人是十分体贴的。此外，清代浙江文人曹庭栋在《老老恒言》中也描述了设计颇具新意且实用性强的书桌，称其“长广任意，而适用于两者”，并将书桌

图3 彩衣堂翻轩装饰

下踏脚处改固定的木踏脚为辘轳形滚动式,可起到按摩脚心“涌泉穴”的功效,由此可见明清江南民居中书房器具之一斑(图4)。

以李渔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对书斋器物细节的关照和改良背后反映出类似于现今提倡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颇具对人的关怀意识,这与深受礼制观念影响的厅堂器物设计中对人的行为和情感的压迫与限制是截然不同的。与受礼制文化浸淫颇深的厅堂相比,古人在书斋环境中必然相异于在正统居处时的居敬、恭持,而表现出另一种闲适和惬意的形象。

四、结语

如前文所言,在礼制观念影响下的关于宫室构筑和室内空间装饰陈设的各种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达到儒家和封建统治者构建相融而契合之世界秩序的政治目的,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完全遵照与符合伦理纲常的规定。在这张以礼制观念为表征、用政治和伦理的经纬线织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天罗地网中,不太需要被统治者有太多的个性色彩,于是明清江南民居的厅堂几乎呈现出“千人一面”的景象。然而礼制对民居中各组成单元的影响正如同把石头扔进水里所推出的一圈圈波纹,居于中心的是受礼制观念左右最深刻的厅堂,于外边缘处不甚明显的某一圈便象征着礼制对书房的影响。

建筑人类学家P.B.琼斯(Peter Blandell Jones)在《建筑的人类学视域》一书中谈到,建筑虽然限定了人类的活动,但其空间模式与人的行为必将形成“共识”(complicity)的关系,即建筑空间与文化习俗最终将达到平衡状态,空间形状得到社会传统文化的认可,社会行为也适于在相应空间中展开。在深受礼制文化浸淫的江南民居厅堂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居敬而恭持,相比之下,书房是文人远离政治与世事的后花园,这里无需张扬或迎合,更多地受到文人自我生活方式的影响,因而比较具有随性色彩。

室内装饰设计中对个人或某一群体的风格,也就是精神修养、个性魅力与生活情趣等的体现在室内设计领域已经大有发展的今天仍属不易,不盲目随波逐流、追求时尚仍然是需要装饰设计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共同努力的方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明清江南民居的书斋环境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礼制文化的束缚,展现出清新、自由



图4

的个性化风格,可以认为是传统室内设计领域中成功的范例。

注释:

[1](明)文震亨.长物志·坐几[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2](明)高濂.遵生八笺[M].重庆:巴蜀书社,1986

[3](明)文震亨.长物志·室庐[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4](明)文震亨.长物志·小室[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1]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拉普普特.住屋形式与文化.张玖玖译.台北:境与象出版社,1985

图4 古代书斋滚脚凳
收稿日期:2008-11-20